

王毓瑚论文集

王广阳 王京阳 王盼 王嵩阳 王瀚阳 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王毓瑚论文集



王产阳 王京阳 王盼 王嵩阳 王瀚阳 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毓瑚论文集/王广阳等编.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10

ISBN 7-109-10255-6

I. 王... II. 王... III. ①王毓瑚—文集②农学—中国—文集③经济史—中国—文集 IV. ①S-092②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639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 傅玉祥

责任编辑 穆祥桐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2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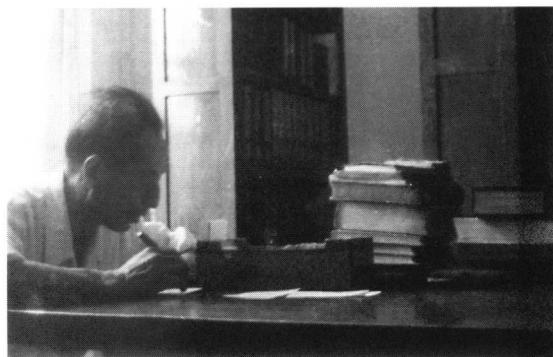
字数: 536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插页: 1

定价: 4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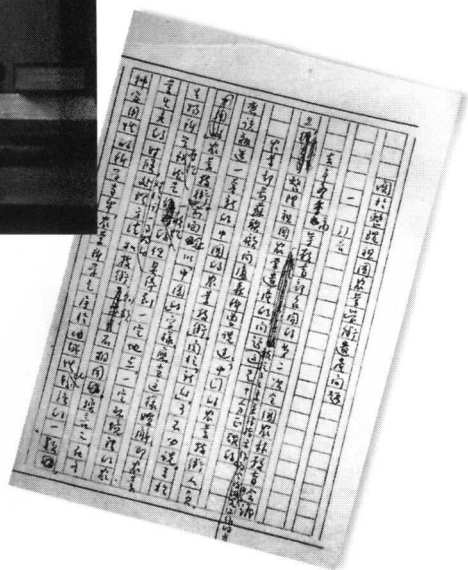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王毓瑚先生像



王毓瑚先生写作



王毓瑚先生手迹（一）



王毓瑚先生手迹（二）



王毓瑚先生在京郊与农民交谈

目 录

王毓瑚教授的学术业绩

——一位中国经济史学家兼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学家

的科学成就 安希伋 (1)

上 编

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	(8)
关于中国农书	(20)
《中国农学书录》序言	(29)
《区种十种》辑本序言	(32)
《秦晋农言》辑本序言	(34)
重刊《农圃便览》前记	(36)
关于《农桑辑要》	(39)
《梭山农谱》前言	(51)
校订《农桑衣食撮要》引言	(55)
《郡县农政》点校本重刊说明	(64)
一部新发现的古农书——《四时纂要》的几个问题	(67)
元代维族人鲁明善著的农书	(73)
《王祯农书》校者说明	(84)
《农政全书》学习笔记	(97)
学习夏纬瑛先生《〈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笔记 ...	(129)
《汜胜之书》耕作部分试讲	(142)
徐光启对于中国传统农学的贡献	(152)
《管子·地员篇》学习笔记	(160)
《中国畜牧史资料》序	(171)

《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前言	(173)
关于几幅中国农业史附图的简单说明	(175)
中国农业史话	(184)
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	(218)
略论中国古来农具的演变	(264)
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	(310)
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	(342)
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	(364)
我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一些特点和问题	(391)

下 编

《经济学解》译序	(414)
《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译者序	(416)
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	(418)
唐代岭南产银与货币经济发展之关系	(447)
隋唐两代的钱币	(462)
慕容燕与拓拔魏时期之军封	(479)
唐代的屯田	(484)
屯田、营田、官庄与官田	(502)
哲里木盟地区农业经济概述	(512)
近代后套开垦试论	(524)
读《禹贡》随记	(545)
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	(561)
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	(572)
《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前言	(585)
卜式和桑弘羊传	(587)
刘晏传	(607)

附录：王毓瑚传略	杨直民 (643)
----------------	-----------

后记	(657)
----------	-------

王毓瑚教授的学术业绩

——一位中国经济史学家兼中国农业历史
地理学家的科学成就

安希俊

王毓瑚教授（1907—1980）于1949—1980年间执教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主要研究并讲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古农书研究。王教授从事的学科与我学习的学科相邻，却不相同。其实，早在1937年，我在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念大二时，我班课表上有一门经济学理论课，主讲教师为王毓瑚教授。因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王教授正在北平，交通阻隔，未能返校，致使我接受王教授系统讲学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有幸以类似传统私塾的方式，受教门下。特别是他的治学精神与处世态度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兹值王教授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又逢王师25周年祭日，借此机会，我粗略补习了王教授中国经济史著作中的若干文稿（含中国农业经济史），于是就不顾外行之嫌，写了这篇短文，主要是记录王教授有代表性的著作和学术业绩，也说一点学习感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部分请见本书附录中杨直民：《王毓瑚传略》）。

王毓瑚教授早年留学欧洲8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慕尼黑大学与法国巴黎大学经济系。完成学业后，于1934年回国，随即投身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直到晚年弥留之际。

回国之初，王教授于教学之余，翻译了两本经济学著作：一

是奥地利人 Spann, O. 所著《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另一本是德国人 Sombart, W. 所著《经济学解》(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次年又作为汉译名著再次印行)。20 世纪 30 年代, 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前期阶段, 市场运行机制有待改进, 也需要借鉴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 这两本论述市场经济理论的译著出版, 可谓恰逢其时, 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规范化与健康发展。王教授晚年, 正值我国开始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 他又把法国人 Marcel Mazoyer 所著《开发自然界农作制的演进与分歧》一文译为中文, 也有外为中用之意。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 王毓瑚教授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经济史。早年著作有:《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1943 年),《中国经济史资料》(40 年代与傅筑夫教授合编, 80 年代出版“秦汉三国”等编)、《隋唐两代的钱币》(1948 年)、《中国农业经济史大纲》(1950 年前后)等;晚年王教授主要著作有:《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1975 年)、《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1975 年)、《我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一些特点和问题》(1978 年)、《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1979 年)等。从上举著作可见, 王教授跨越学科广阔, 又以历史和地理两科为核心。王毓瑚教授治史, 既取材于正史, 也重视非正史资料。先后撰写了数十篇论文, 或为断代史, 或为专题讨论。多方考证, 进行分析,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种相关因素, 务求确切。他的著作, 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 从客观经济规律着眼阐述并分析经济现象及历史过程。我认为这是王教授治史的一大特点。王毓瑚教授的学风, 在他为《史记·货殖列传》这篇历史名著作注释并进行研究和评论中, 集中体现了出来。他认为, 研究司马迁这篇著作, “应当抛开一切个别字句上的纠缠, 改从大处着眼, ……抓住作者立论的实质”。并指出: “太史公在这里讲的是春秋以后大约三个世纪中的世事变局。此所谓‘变’, 是改变了受宗法制度的约束的那种死板的、静止的

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面。一切都变得活动了，首先是人的经济活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从种种礼法规范清规戒律中冲出来了，从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自由活动的世界。”太史公把这个自由、活跃的世界归结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追述了战国以来上下追逐财富的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方式〕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变化。还列举了一连串成功的产业活动家的事迹。总结为：“富者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优胜劣败取代了世袭制度。王教授指出，在惟利是图原则下，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不再是出身，而是个人所掌握的财产。在封建秩序没落之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格局，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他对《史记·货殖列传》一文评价说：“在短短的篇幅中，有理论，有史实，有经济地理，把几个世纪当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夹叙夹议地描绘了个淋漓尽致，这确是一篇大文章。像这样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议论和铺陈，在我国旧的史书中堪称空前绝后。”并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的论点，“与西方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在经济方面的理论是极其相似的”（重点符号是本文作者所加）。

不过，王毓瑚教授并不完全赞同太史公的观点。主要有两条，一是不同意太史公“工不如商”的论点。在所论3个世纪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确实起过很大作用。但是从较长期来看，经济支柱毕竟是产业，而不是商业。没有产业的发展，财富又怎样转化为资本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商业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即发动了产业革命，不断继续积累资本，发展经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从秦汉以来“走向了单纯以赚钱为主而忽视生产的路线。而且历时多少个世纪始终没有转向的机缘。此中原因何在，这应该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主要课题”。第二条，王教授不同意太史公说的“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的论点。王教授认为：这只是说“富”可以比得上“贵”，而不是说“富”要代替“贵”，力争建立自己的政

权。这就与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则取旧政权而代之。可见，中国工商业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先天的软弱性，多少世纪以来，始终只能做现存政权的附庸。关于这一论点，王教授在随后撰写的另一篇论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发挥，并点出：秦皇、汉武帝建立的专制封建王朝所推行的国家垄断经济体制，更加压制了民间工商业的活动空间（《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撰于1979年，1981年3月刊登在香港《抖擞》双月刊43期）。王毓瑚教授对《史记·货殖列传》的研究与评论，集中体现了他的独到的历史观。

王毓瑚教授还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他在好几篇论文中都涉及到经济地理问题，包括前文介绍的《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在内。我认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当首推所著《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脱稿于1977年。以下作一简要介绍。

这篇长文描述了从春秋战国以来几次较具规模的农耕区北移的过程，其中规模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这一轮农耕区北移的动因，主要是：在结束了蒙古、汉、满三族频繁的战争之后，内地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粮食需求越来越大。而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受技术停滞的制约，生产效率很难进一步提高。为求生存，内地农民迫切要求移垦。汉人北移几乎历来都是他们谋求新生活的老路。而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虽然早有农耕，却只是星星点点，还有大片荒地。特别是满人进关后，东北地区更是地广人稀，急待开发。在这种形势下，虽然清朝初年政府采取了保护满族发源之地的政策，禁止汉人移垦，但是这个政策在移民洪流浪潮中，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山东人蜂涌渡海北进，先后开发了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大平原，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农业区。这段耕区北移的经历，体现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威力。

农耕区向蒙古牧区的移动，也受到清政府的阻挠，满人主要

是防止蒙古、汉结合，危及清朝统治。但是，后来农业还是逐渐扩展到了牧区较为适合农耕的地区，并得到不断发展。王毓瑚教授对农耕移入牧区还有两点评论：第一，游牧业逐水草而居，不断流动，只是使用自然资源，却不保护和培养自然资源，这种生产方式，带有掠夺性质。而农耕则不同，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保护和培养自然资源。所以，从牧业转变为农耕可看作生产力的飞跃。第二个论点是，在牧区滥垦，破坏了生态平衡，引起土地沙化，贻害无穷。

王教授对农耕区向北扩展过程的描述和评论告诉我们，经济地理的变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虽然本质上它是经济活动的横向变化，却会涉及种族关系的融合或冲突、政府政策的取向、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等。而影响所及，既可能体现为生产力的飞跃，同时又可能遗患无穷。王教授这篇论文所体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与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分支的区位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

在学习王毓瑚教授所著论文过程中，我深切感到，他的治学精神可谓气度恢弘，学术造诣博大精深，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2005年3月4日

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 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引言

农业部前苏联顾问卢森科同志曾说过：“中国的农业技术人员应该创造一套新的、中国的农业技术。”关于“新的”可不必说。至于农业技术前面冠以“中国的”字样，应该这样理解：即农业生物学原理虽然是一般性的，但具体到一定地点、一定环境里的农业生产的时候，对于同一事物的处理方法和技术则颇不相同。换言之，在各种实用性的科学当中，农业科学是属于地域性比较强的一类。如果要讲理论联系实际，似乎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更是必需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也同其他一切真正的知识一样是从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数千年来自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现在要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原则之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农业学术。而所谓本国实践，也应当包括总结过去本国原有的农业学术在内。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正是根据这个观点，现在来谈谈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

二、对于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些认识

我国过去号称“以农立国”，这句话包含着一种意思，即本

^{*} 本文系 1955 年 1 月 18 日在北京西郊罗道庄北京农业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刊于《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55 年 10 月 1 卷 1 期。

国所需的生活资料，特别是食料，基本上一向是凭自给的。这是与从来就是依赖输入的欧洲各国完全不同。我国居民众多，也是自古已然。两汉末年，只“注籍”的人口已经接近 6 000 万人，实际的数目当然更大，大约同十四五世纪全欧洲的居民相等。居民多也就是对食料的需要大。既然没有输入可以依恃，这一沉重的供应任务自然完全由本国农民承担起来。在这里还应计算到，由于种种原因，历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并不是像一般所想像的那样多。历代的政论家们常常谈到“游食者众”，话虽不免多少夸大，但也多少反映了这方面的现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相对地少，也就是每个生产者必须生产出来更多的农产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农民，就不得不想尽方法来增加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之所以发达的较早，主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比起欧洲各国来，我们的农业摆脱真正的休耕制要早多少个世纪。与此相应，使用肥料，特别是有机肥，在我国也开始的较早。公元以前，我们的农学家已经发明出来精密的“代田法”，对于作物轮栽也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一般说来，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是缓慢的。农业方面也似乎是没有进步。这在一定程度内也是不容否认的。例如现在农民所使用的农具，仍然是相当原始的。写成于 14 世纪的王桢《农书》，甚至 17 世纪的《农政全书》，其中许多地方还是因袭 6 世纪时人所著的《齐民要术》。不过进步的缓慢是相对的，就是说，如果考虑到古代所已达到的水平以及两千年这样悠长的时间，这样的进展是不能算快。进步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这里抛开不谈。但如果进一步来观察，就要承认，绝对的进步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在这里只需想到我们的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品种是不断地在增多，多少外来的品种经过风土驯化，在我国境内繁殖起来。许许多多的操作方法也都常有改进。试以嫁接为例。这种方法，我国的农学家知道的很早，以后不断获得丰

富与提高。14 世纪末期人所著的“种树书”中，记载着种种有趣的植物嫁接。17 世纪中王象晋的《群芳谱》里面，又谈到嫁接与培育相结合来促成变异的办法。《花镜》的作者更进一步肯定了嫁接在改变植物性状上的多方面的效果。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水利田的开发。长江以南各地主要是水田区，生产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我们的农民创造出来种种因地制宜的水田制度，如太湖区域的圩田或围田，洞庭湖一带的垸田等等，更不必说各地普遍存在的梯田。这种种耕作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就地取材，代价低而效果大，并且是将开发水利同防治水患二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些成就体现着多少世代农民的劳动与智慧的积累。在我们的历史上，全国的经济重心是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水田区域成为全国的谷仓，因而灌溉也就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而水田的经营技术的发展，就时代来说是比较靠后的。因此应当承认，我们的农业技术很早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后来还是续有改进的。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就必须设法增大农业经营的集约度。但由于种种原因，生产资料方面的增加是有限的，因此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所谓“劳力集约”。这里包括了体力和脑力两个方面在内。除了劳动的强度提高不谈而外，特别是在操作方法和技巧方面，历代农民是不断地在开动脑筋找窍门，发明创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无数的特殊方法和技巧产生出来。也同各种手工业者一样，我们的农民拥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秘诀”，像最近大家传说的白菜中间夹种韭菜可以防病的方法，就是一个例子。又如稻农插秧的技巧，也是令人惊异的。这些技巧和“秘诀”在农民中间世代相传，并且时有改进。

说到这里，就要联带指出，中国农民并不像过去某些人说的那样本性保守。不是的。说我们的农民本性保守，就如同说他们喜静而不喜动同样是似是而非之谈。由于任务的沉重，我们的农